

誰來審議？

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

林國明*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審議民主的實踐所遇到的重大挑戰，是如何制度化地整合到決策過程並影響政策決定。公民審議的制度化，有賴社會公眾的支持和參與，但既有文獻幾乎都沒有探究一般民眾對政府所發動、意圖影響政策的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本文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4年的調查結果，分析台灣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本文發現，由於特殊的政治脈絡因素，台灣民眾普遍支持公民審議，而且，對代議制度越不信任、對政黨功能和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越不滿，以及越支持直接民主的人，越可能支持公民審議。本文也探究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社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和社會不平等的關係。本文發現，社團參與，以及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能夠養成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等公民心性與能力，提高人們參加正式的公民審議的意願。因此，活絡的公民社會以及日常的公民對話，能建構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強化社會公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但本文也發現，性別與教育程度會影響公民心性與能力，因此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呈現不平等的現象，這是強調平等原則的審議民主，在實踐上必須面對和克服的問題。

關鍵字：審議民主、公共審議、公民參與、公民社會、公民討論

台灣社會學第31期（2016年6月），頁43-97。

收稿：2015年5月20日；接受：2016年2月3日。

* 通訊地址：10617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mail: kuoming@ntu.edu.tw。

Who Will Be Willing to Deliberate?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Taiwan

Kuo-ming L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re said to be good for shaping active, democratic citizenship, b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have not been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explor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inequality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Using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conducted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lores citizens' support for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organized deliberation. I found that 73% of respondents agreed with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convene citizen deliberation before making decis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and 53%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uch events. What accounts for the public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that : (1) Civic talk, defined as engagement in conversations about social events in informal settings, influenced the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 (including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interest,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y); (2) The number of those joining various type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lso affects the willingness to deliberate, largely by producing mobilization effects on civic talk; and (3) Women and the less-educated are les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becaus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gender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 This paper thus found that civic talk and social capital can help construct a civic-culture foundation for deliberation, but

inequality persists and needs to be overcome in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claimed to fulfill the ideal of political equality.

*Keyw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ivic talk,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discussion*

一、導言

當前代議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許多公眾的失望與不滿；與此同時，審議民主的實踐與理論，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則有長足的進展。支持菁英政治和專家決策的倡導者，認為一般公民是「盲目、無知、短視近利」，需要他人來為他們「真實的利益」代言 (Held 2006: 157-198)。審議民主論反對這種說法，認為公民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一般民眾應該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意見形成。但是，公民的偏好必須在溝通的過程中，經過相互批評和反思，才能對自己、他人和社會整體的利益，有清晰的理解。廣納公民參與對話、尋求協議的社會過程，使各種衝突的利益和觀點，能夠得到公平、周延的考量，如此形成的決策，才能落實政治平等的民主原則，提升民主決策的正當性和品質。這套原本是規範層次的民主理論，在上個世紀末進入實踐階段。各式各樣創新的公民審議模式，在全球各地大量湧現；有的公民審議由民間組織贊助，有的則由政府機構發動。儘管審議形式各異，眾多經驗研究都指出：「當不同背景的公眾聚集在一起，只要能提供事實的資訊，設計良好的審議環境來支持高品質的討論，人們所做的集體決定，往往比既有的政策架構更包容、更公正，也更能反思公共利益」(Lukensmeyer 2014)。研究文獻也顯示，審議的過程，能在微觀的個體層次產生轉化的效果，提升公民的知能和道德品質，養成健全的民主體制運作所需要的公民德性。¹ 倡議者因此認為審議民主可以矯正當前民主體制運作的弊病。不過，倡議者也承認，審議民主的實踐面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在鉅觀的體系層次，公民審議並沒有促動決策結構的變革。在美國致力於推動日常公民審議的實踐者 Martha McCoy (2014) 反省說，公眾在審議場域所展現的賦權之聲 (empowered public voice)，並非日常公共生活的常態。廣大的公民之

1 關於公共審議的效果，請參閱 Delli Carpini et al. (2004) 詳盡的文獻回顧。

間，以及公民與政府決策之間，往往失去連結關係；政策決定還是掌握在傳統政治菁英手中，並非來自公民相互說理的溝過程。她說：

即使民主創新與實踐持續地進步，這些實踐也產生有意義的結果，但我們還沒能夠影響大多數人們的生活。這就好像雖然我們知道有什麼有效的藥物可以治療蔓延的疾病，卻還沒想出法子來大量生產與分配。

雖然許多實踐的反思，如同 McCoy 這位推動者，都關心審議民主與公民日常生活的連結，但是，重大決策前是否應該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意見讓政府參考？還是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社會公眾支持哪種決策模式？如果政府在做決策前，先辦理公民審議活動，誰願意來參加？我們對這些問題，所知非常有限。

不瞭解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我們就無法妥切地探究審議民主的運作如何能形塑影響民眾生活的政策決定。當然，公民審議能否形塑政策決定，受到政治體系諸多條件的限制，如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林國明 2009；Dryzek and Tucker 2008），以及非審議的決策模式和審議要素之間的連結（Parkinson and Mansbridge 2012）。可是，如果社會公眾不支持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活動，認為政策決定應該交給透過選舉取得權力的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以及具有專業知識的專家，那麼，要將公民審議形成的意見納入政府決策，如何能有正當性？再者，審議民主的規範基礎是政治平等，主張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人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審議的過程（Elster 1998; Fishkin 2009）。現實上，不可能所有的公民都參與審議活動，那麼，誰來參加審議？許多女性主義者和差異民主論者認為，公共審議其實會排除社會弱勢者，無法體現政治平等的原則（Fraser 1994; Sander 1997; Young 2001）。如果只有優勢者參加並支配審議的過程，如此的公共審議，勢必被質疑「缺乏代表性」；審議的結論，也會被指責是

「偏差的民意」。批評者將會指責，政策決定如果要聽取「缺乏代表性的偏差民意」，那是缺乏民主正當性的。審議的不平等是否真的存在？國內學者曾經分析不同社會位置的公民進入政府贊助的審議論壇之後，言說互動是否存在不平等（林國明 2014），但我們對於「誰來審議」，什麼因素影響人們參與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活動，是不是優勢群體更願意參與審議活動等問題，仍然所知不多。

本文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探問「誰來審議」的問題。我要探問的，不是哪些人實際出現在審議的場域，而是誰願意參加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探問參與意願，其實是直指參與不平等的核心。Henry Brady 等人在政治參與的經典文獻中指出，「誰來參與」的問題，可以從「為什麼有人不參與」的反面問法來尋找解答的線索。他們認為，人們不參與政治，可能有三種原因：沒有意願、沒有能力、沒有管道 (Brady et al. 1995)。女性主義者 Iris Young (2003) 在討論公共審議的排除效果時也指出，人們要能進入公共審議的場域，必須有管道得知活動消息、有能力從工作和照護的負擔中挪出時間、能瞭解審議的議題，也要有參與的意願。管道與能力，在社會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參與的意願也是如此。眾多審議模式的公民參與，都是自由選擇參加；某些審議模式，考慮到參與意願造成「自我選擇」的偏差，會使用隨機或分層抽樣方式挑選參與者，使參與審議的人口特質和社經背景，儘量與全國或地區人口接近 (Brown 2006)。但是，如果特定人群參與意願低落，無論採用何種抽樣技術調整，還是會造成偏差的結果（林國明 2013）。因此，探問誰有意願來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就是在探問審議民主是否能夠實現政治平等的原則，也涉及公民審議能否與決策體制結合的正當性問題。

在探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之前，必須瞭解人們是否支持公共審議。如果人們不支持公民審議，認為政策決定應該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做決定就好，很可能就不願意參加這類的公共討論。除此之外，參與意願受到動機、能力和資源的影響。人們不願意參與，可能是政治效能感很低，認為參加這種討論沒有用，或是對政治沒有興

趣（動機層次因素）；也可能是認為自己對公共政策不瞭解，或表達能力不好（能力因素）；也可能是工作太忙、沒時間（資源因素）。政治參與的文獻指出，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人口特質和社經背景，影響到動機、能力與資源，因而對參與意願產生影響。人口特質和社經背景之外，文獻中一直認為社團參與是影響政治參與最重要的因素 (Schlozman 2002)。在社會資本論的風潮下，「新托克維爾主義」認為參加結社組織，可以提高人們的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參加結社組織能夠強化人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除了社經地位和社團參與之外，本文尤其關心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公民討論 (civic talk) 是否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當前審議民主實踐的主要模式，具有「程序主義」的特性 (林國明 2013)，都有一套結構化的程序規則，來徵求和挑選參與者、提供資訊、引導討論進行並形成結論。程序主義的審議模式，雖然呈現蓬勃發展之勢，但多數公民仍無緣參與這類正式的審議。不過，許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會與熟識或不熟識的人，非正式地談論政治或社會議題。這種非正式的公民對話，政治溝通的領域已累積大量的研究文獻，探討發生的頻率、性質與效果，但是審議民主的文獻，卻很少關注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泰半是因為程序主義的偏見，使審議民主的實踐者和研究者，認為日常的公民討論「不夠審議」。審議民主的推動者，雖如前面所言，關心公共審議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思索「高品質」的討論如何「大量生產」，擴散到日常的公共生活，卻很少探問日常生活非正式的公民對話，如何影響正式場域的公民審議。一些關切審議不平等、批判程序主義審議模式的女性主義者，雖然倡導日常生活領域的公民對話 (Fraser 1994; Young 2000)，也沒有探究非正式公民對話與正式審議之間的關係。關切審議不平等的文獻，大多忽略政治溝通的文獻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公民對話，能夠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政治知識，因而提升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如果日常的公民對話，的確能夠養成公民能力與習性，是否也能促進人們參與正

式的公民審議的意願？這是本文想要探索的問題。

如果日常公民對話的土壤可以長出公民審議的茂盛花朵，我們便要進一步問：如何使土壤更肥沃？傅仰止 (2014) 的研究指出，參與社團的類型越多越能提高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本文想進一步探究，結社，除了對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有獨立效應之外，是否也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進而提升人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將結社、日常公民討論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做分析上的連結，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前面提到，當前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許多不滿。如何矯正代議民主的弊病，學者開了不少處方，除了審議民主之外，另一道重要的處方便是「社會資本論」，認為廣泛參與結社活動，能夠促使公民積極參與政治。有積極活躍的公民社群，民主政體的政府表現也會比較好 (Putnam 1993, 1995, 2000)。到目前為止，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的文獻甚少對話。另外，如前所述，審議民主的研究與日常公民討論的文獻，也少有交集。本文將這些各自分隔的領域進行連結與對話，這樣的分析連結有重要的實踐意涵。社會資本，可能不僅如現有文獻所說的，直接影響「公民社會」的壯大而矯正民主體制的弊病，它可能同時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透過公民對話，間接地建構了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我們也可以順著這樣的分析，進一步探索擴大社團組織與公民對話，是否能夠降低社會人群之間參與審議的不平等？

政府支持的公民審議，雖在全球各地風起雲湧地出現，但是，目前還沒有研究以系統性資料，同時探討特定政治體系中的社會公眾，對政府辦理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本文是首先做此嘗試的研究，²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4 年第六期第五次調查中公民權組的問卷調查結果，探討以上提出的問題。

2 Michael Neblo et al. (2010) 的研究雖然探討了參與意願，但並沒有討論公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以及兩者的關聯。

二、政治脈絡與公民審議的公眾態度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誰願意參與政府舉辦的公民審議會。在分析參與意願之前，必須先瞭解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以便檢視影響支持審議民主的因素，是否也對參與意願產生影響。目前雖無文獻以系統性資料分析哪些因素影響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但從相關理論與有限的經驗研究，我們還是可以推測一些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Annika Porsborg Nielsen et al. (2007) 分析社會普行的民主價值，如何影響體現審議民主理念的公民會議 (consensus conference) 在法國、丹麥和挪威的發展命運。倡導審議民主，經常是為了矯正代議民主體制一些廣受詬病的缺陷，例如，公民的政治冷漠或缺乏參與機會，以及政策決定缺乏說理的成分，希望在選舉政治、專家決策和利益團體的運作之外，提供公民直接參與政策討論的機會（林國明、陳東升 2003；林國明 2009；Fishkin 1997；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Nielsen 等人因而認為，社會公眾對代議民主所抱持的信念，影響到公民會議的發展命運。他們的研究指出，在法國公民會議無法被廣泛接受，是因為法國公眾和主要政治社會行動者認為，民主正當性的來源，是由民選的政府首長和民意代表，依據公平與透明的程序來做政策決定；政策決定如果要透過公民會議來徵詢少數民眾的意見，這是與代議民主的本質相衝突的。相較之下，公民會議在丹麥能被廣泛接受，則是因為丹麥具有強調公民積極參與的民主傳統。Ida-Elisabeth Andersen and Birgit Jæger (1999) 也認為，做為審議民主實踐先鋒國家的丹麥，之所以廣泛採用公民會議、願景工作坊 (scenario workshop) 等公民審議模式，主要是因為丹麥公民積極參與各種事務的討論與決定，因而創造整合性的政治過程。從這樣的觀點，我們可以推論，如果民眾對代議民主體制的運作越不信任，以及越具有直接民主的信念，越可能支持政府在決策之前，先行召開公民審議會來徵詢社會公共的意見。

國際文獻比較少注意到政黨競爭的政治脈絡如何影響社會公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在國內文獻方面，林國明 (2009: 183-184) 曾分析 2004 到 2008 年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為何大力推動審議民主，他認為藍綠陣營的「政黨惡鬥」，使得許多政策議題無法理性討論，以及「分裂政府下的政黨對抗與政策僵持似已滋長政治疏離並為治理危機響起警鐘」（引自鄭敦仁 2004: 28-29），這樣的政治現實，使得審議民主的理念對一些政治社會行動者或公眾具有吸引力；例如，民進黨部分行政首長察覺到這種民意風向，於是「想藉勢而為，透過公民會議所建構的民意來突破政治僵局」。根據這個政治脈絡的解釋，我們可以假定，社會公眾如果對政治現狀較為不滿，認為政黨無法提供人們政策選擇，比較可能支持審議民主。

林國明 (2009) 也提到，部分民進黨行政首長熱衷於推動公民審議，是因為具有「草根民主」的信念。國民黨在 2008 年重新執政之後，中央政府對審議民主的推動急凍般冷卻，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黨內菁英排斥參與民主。例如，馬英九在 2008 年競選總統提出的「憲政改革政策」指出，「局部性的公民會議並不能取得民主決策的正當性」，而是應該「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內部自行建立理性審議的程序」。³ 我們假定政黨領導人與政黨支持者的信念有一定程度的聯繫，因此，泛綠選民可能傾向於支持審議民主，而泛藍選民則傾向於反對審議民主。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假定台灣民眾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以及政黨提供政策選擇的功能越不滿意，越支持直接民主；另外非國民黨支持者，比較傾向於支持審議民主。我也將評估這些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支持傾向，是否影響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影響支持公民審議的因素，也可能影響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Michael Neblo et al. (2010) 的著作是既有文獻中，唯一以全國性問

3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8)。

卷調查探究民眾參與公共審議意願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一般民眾大多討厭政治，對公共事務缺乏參與意願，但如果他們對政治體系的運作現狀感到失望、不滿，可能會比較願意參與審議，因為這種參與模式是傳統黨派政治的替代選項。根據這種說法，參與意願和對現有政治體系的負面評價有關，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以及政黨提供政策選擇的功能越不滿意的人，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越高。

不過，本文真正關心的不是政治脈絡因素對參與意願的效應，而是參與審議的意願和結社、日常公民討論，以及社會不平等的關聯。這種關聯是 Neblo et al. (2010) 所忽略的。以下先針對這個部分做討論。

三、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與社會不平等

審議民主仍是定義紛雜的概念，一般的界定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受到政策所影響的公民，有機會可以直接參與政策決定，這是審議民主的「民主」部分；二是，公民的參與是透過公共討論的形式來形成集體意見，這是審議民主的「審議」部分 (Elster 1998)。根據這樣的界定，本文將審議民主操作化為：「政府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邀請一般民眾來參加討論，提出政策建議讓政府參考」。這個操作化定義符合審議民主概念的兩大要素：直接參與和公共討論。

公民參與政策議題的公共討論，形式繁多。根據以上的定義，我把公民審議局限在政府所發動的，具有政策影響意圖的公共討論。本文所指涉的公民審議，因而是一種政治參與的形式。既有文獻對政治參與的界定，主要是跟隨 Sidney Verba 等人的定義：「具有影響政府行動的意圖或效果的活動」。這類的活動可能是直接地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如請願、連署、遊行、接觸政府官員等，或者是間接地透過影響選舉來影響政策，如投票、捐錢給政黨或助選 (Verba et al. 1995: 38)。Verba 等人的定義，排除日常的政治討論，曾被批評為太過

狹隘 (Teorell 2006)。傳統的政治參與研究通常並不包含公民審議這類新興的參與形式，但本文所界定的公民審議乃意圖影響政府政策的活動，仍在 Verba 等人所界定的政治參與的概念範疇內，因此可以援引政治參與的相關文獻來討論影響參與公民審議意願的因素。

政治參與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科學中非常成熟、熱門的研究領域，國內也累積不少文獻，研究公民責任、民主價值、效益與成本、社會資本、交叉網絡 (cross-cutting network)、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政治討論、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等眾多因素對政治參與的影響 (王鼎銘 2007；吳俊德、陳永福 2005；吳重禮、李世宏 2005；吳重禮等 2006；林聰吉 2007；王靖興、王德育 2007；林瓊珠、蔡佳泓 2011；林珮婷 2014)。這些研究所探討的政治參與，都局限在選舉和投票行為；另外，除了少數例外 (如楊婉瑩 2007；林珮婷 2014)，國內政治參與的既有文獻，很少關注不平等的問題。

但在國外文獻中，不平等是政治參與研究的核心問題。誠如 Verba (1996) 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就任演說中所說的，政治參與的不平等，使某些人對政府操縱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是困擾民主政治的問題。他和其他學者指出，從代表的觀點來說，那些比較少參與的公民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政府官員少有機會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所以比較不會注意他們的關切、偏好和需求，結果就違反了「政府應該回應所有公民的偏好」這樣的民主理想 (Verba et al. 1997: 1053)。因此，探問「誰參與」、「誰不參與」，其實是關切「政治平等」這個民主核心價值。而如前所述，人們之所以不參與政治活動，可能是三種因素所造成的：沒有意願、沒有能力和沒有管道。雖然本文所要分析的是參與意願，不是實際發生的參與行為，但是既有文獻都把參與意願這種心理涉入 (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 當做實際參與的必要條件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分析誰有意願來參與，因而是瞭解參與不平等的關鍵問題。

既有文獻一般都從動機層次來解釋參與意願，尤其是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興趣。早在半世紀之前，學者就指出，如果人們對政治議題漠

不關心、缺乏興趣，認為自己對政府的作為沒有影響力，很難想像他們會願意涉入政治活動 (Prewitt 1965)。除了動機層次的政治效能和政治興趣之外，公民能力也可能影響一般民眾對公民審議的參與意願。與其他公民一起討論公共政策，需要有起碼的溝通能力和對公共議題的瞭解，認為自己表達能力不好、欠缺政治知識的公民，可能怯於在公開場合發言，因而缺乏參加審議的意願。

在本文中，我將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這四個因素合稱為公民心性與能力 (civic mindedness and skills)，它指的是人們涉入政治活動與公共事務所須具備的基本心理特質與技能 (Verba and Nie 1987; Comber 2003; Van DerMeer and Ingen 2009)。公民心性與能力在社會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在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已累積大量的文獻，以這些稟賦的差異解釋不同社經地位的人群在政治參與上的不平等。在社會經濟地位變項中，教育程度一直是影響政治參與最普遍、穩定的因素 (Schlozman 2002)。眾多文獻發現，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識和公民技能都比較高，因此比較常涉入政治活動。⁴學者從兩方面來解釋教育的效應。就「人力資本」的解釋來說，教育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比較有知識基礎能夠瞭解複雜的政治過程、理解政治資訊，因此能發展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心理取向與公民技能 (Delli Carpini and Keeter 1993; Verba et al. 1995)。就「社會資本」的解釋來說，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有較高的收入、從事聲望較好的工作，也比較常參加社團，因此常置身於能夠連結到政治活動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提供的社會接觸機會，能夠養成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民心性與能力 (La DueLake and Huckfeldt 1998; Nie et al. 1996)。

影響參與不平等的社會特徵，除了教育程度之外，性別也普遍受到關注。女性的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一般都

4 參見以下的文獻：Almond and Verba (1989); Campbell (1980); Kam and Palmer (2008); Verba et al.(1995);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低於男性，在許多經驗研究有一致的發現⁵；Verba et al. (1997) 的研究也顯示，正是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性別差異，使得女性的政治參與程度低於男性。至於什麼因素造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性別差異，理論的解釋則很分歧。⁶ 有的從結構觀點（女性的社經地位使她們缺乏資源、家庭角色與照護責任使她們的活動局限在私領域），有的從社會化的角度（女性從小被教導「政治是男人的事」），來解釋為何女性比較缺乏參與政治的動機和能力。國內學者楊婉瑩 (2007) 的研究指出，社會化觀點較有解釋力，但結構條件也透過對社會化的作用間接影響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

文獻上大多認為，不同社經地位的人群在政治參與上的不平等，主要是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所造成。本文因此想瞭解，參與的不平等是否顯現在公民審議這種政治參與形式？國內不少文獻關切公共審議領域所存在的不平等，例如，黃競涓 (2008) 認為審議民主強調公共說理的言說風格，使得處於結構劣勢的女性無法平等地參與審議；范雲 (2010) 的實證研究指出，女性和其他劣勢群體，確實比較常用「講故事」，而非說理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在理性言說的審議場域中，林國明 (2014)、陳東升 (2006) 和張譽馨 (2010) 的經驗研究都發現，性別和教育程度影響某些言說互動面向的不平等。然而，這些對審議不平等的關注，局限在實際的言說互動。本文想進一步探究，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也有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本文假設，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越強的人，參與公民審議的願意越高；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在這些公民心性和技能方面較低，因此也比較缺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5 參見以下文獻：Baxter and Lansing (1983);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 Mondak and Anderson (2004); Tolleson-Rinehart (2013); Shapiro and Harpreet (1986); Verba et al. (1997)。

6 參見 Bennett and Bennett (1989) 和 Verba et al. (1997) 對這些理論觀點的討論。

四、社團參與的深度與廣度

如果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是促進政治參與的因素，那麼什麼條件和環境可以養成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學者們大都認為，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在人們的生命歷程中習得的，個人日常生活所坐落的制度脈絡，如家庭、學校、宗教、工作場所和社團等，都可能產生促進效果 (Schlozman 2002)，其中，研究者最為關注的是結社的效應。最近二十年來，在 Robert Putnam (1993, 1995, 2000) 所倡導的「社會資本論」影響下，結社對政治參與的促進作用，蔚為研究風潮，但也產生很多爭辯，這尤其顯現在「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兩派，對社團參與的「深度」和「廣度」何者較能促進政治參與的辯論。

Putnam (1993: 89-91) 借用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1968) 的觀點來建構他的「社會資本論」。他說，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質，像是規範、信任和網絡，能夠促進協調的行動而使社會更有效率」(Putnam 1993:167)。早期，Putnam 把參與自願結社所產生的政治社會效果，聚焦在社會信任，他認為社團參與提供人們面對面互動和合作機會，能夠產生社會信任，並透過社會信任的因果機制，促進政治參與行動。這樣的因果連結，在經驗上缺乏充分的證據支持，研究發現也不太一致。許多研究指出，參加社團不見得會產生社會信任，而社會信任也不見得會導致政治參與。⁷ 學者後來逐漸放棄從社會信任的角度來分析結社的政治參與效應。Putnam (2000) 後期的著作關照到比較廣泛的效應，不再只聚焦於社會信任，他提到結社除了灌輸參與者合作和重視公益的精神之外，也培養他們參與公共生活必要的實踐技能，如組織與溝通能力。可是不論是前期或後期的著作，Putnam 的社

7 參考 Foley and Edwards (1999); Kaase (1999); Newton (1999, 2001); Newton and Norris (2000); Uslaner (2002)。

會資本論，對結社的效應都是採取一種「社會化機制」的理論立場。在參與社團活動中，人們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接觸和協力合作，擴大了知識、提高了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也養成溝通、組織的能力，因而習得能夠加以運用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根據這種被稱為「新托克威爾主義」的觀點 (Van Der Meer and Ingen 2009)，積極參加社團、與其他成員進行頻繁的面對面互動，並且產生社會聯繫 (social connectedness)，比起只是繳交會費、偶爾參加活動的消極成員，更可能從社會化的過程習得公民心性與能力 (Putnam 1995)。

「社會化機制論」受到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積極參與社團的人，比消極參與的人，更具有可能發展出參與政治的公民心性與能力 (Verba and Nie 1987; Leighley 1996; Torpe 2003)，但近來，「動員論」的觀點對社會化機制論提出挑戰。動員論質疑的，不是積極參與社團者是否比消極參與者有更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而是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是否影響政治參與程度？即使積極者有比較強的動機與能力，但是影響人們實際參與政治行動的，除了動機、能力之外，必須要有管道。動員論認為，結社之所以能促進政治參與，關鍵因素是創造了社會網絡，將人們連接到政治動員的管道 (Leighley 1996)。即使是消極的社團成員，也能獲得動員的訊息。如果人們參加很多個社團，就算每個都涉入不深，還是可以從「弱聯繫」的多重網絡中接觸到多方的資訊，而更可能涉入政治活動 (Teorell 2003)，因此，動員論者認為，參加社團的數目（廣度），比參加社團的頻率（深度），對政治參與的效應更大。這個論點已獲得一些經驗證據的支持 (Alexander et al. 2012; Wollebæk and Strømsnes 2008)。

「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爭論的是結社對實際政治行動的效應，本文關切的是參與意願，不是實際行為。前面的討論已經指出，意願受到動機和能力因素影響。重視政治參與動機與能力養成的「社會化機制論」，是不是比「動員論」更能解釋參與意願？這倒未必。社會化機制論的因果路徑是：參加社團，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促進了政治參

與。批評者指出，這種因果推論忽略了，大部分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在社團以外的場域習得，如家庭、工作、媒體接觸與非正式社會網絡等 (Alexander et al. 2012)，也忽略了政治參與行為和公民心性與能力之間，有相互影響的效應 (Leighley 1996)。參加很多社團的消極成員，如果因為動員網絡的影響而經常參與政治活動，他們可能從這些「社團外」的行動中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在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等方面，未必低於積極參加社團的人。

另外，「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在討論結社對政治參與的效應時，都忽略了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人們在社團中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大多透過交談的形式進行。交談的形式繁多，就像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1968) 提到的，有的是針對共同的興趣和合作的目標進行嚴肅討論，有的是隨意閒聊；透過社團成員的意見交換，人們擴大了胸懷並發展了思想。社團成員大多是相同背景、興趣和目標的人，所以成員的交談，即使是閒聊也很容易觸及共同關心的社會議題；這些交談一開始不見得有政治的內涵，但隨著談話的開展，可能討論到與公共政策和政治有關的事物。如以下的討論所要指出的，許多經驗研究顯示，政治社會議題的日常討論，能夠養成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因此，「社會化機制」認為頻繁的面對面互動可以養成政治參與的動機和技能，可能是因為社團參與提供了日常公民討論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可能外溢到社團外的情境，例如，人們可能和參與社團時認識的人在社團活動以外的場合進行互動與交談。所以參加許多社團的消極成員，可能因為社會接觸層面比較廣，而有許多與人討論政治社會議題的機會。傅仰止 (2014) 就以台灣的實證資料指出，參加社團數目越多的人，從事政治社會議題討論的頻率也越高。⁸ 而如果日常公民討論能夠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的話，我們可以預期參加社團數目越多的人，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也越高。因此，由於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社團參與數目

8 他的分析模型並沒有納入參與社團的頻率。

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效應，未必低於社團參與頻率。

「社會化機制論」和「動員論」雖然爭論參加社團的深度與廣度，對實際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但是對於可能影響參與意願的公民心性與能力，相對效應如何、何者較有解釋力，既有文獻並無定論，因此，我採開放立場，在本文分析中，同時納入參與社團的數目與頻率，來評估這兩項因素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相對重要性。

五、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

前面提到參與社團能增加日常生活中與人談論政治的機會。其實，在社團之外，人們在許多場合，在各種社會關係網絡中，經常與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學、同事，熟識或不熟識的人，談論社會事件和政治議題。最近二十年來，政治溝通領域累積許多這方面的研究，探討日常政治討論所發生的社會情境、頻率、網絡大小，意見的異質程度，以及對民主政治可能產生的影響。⁹ 雖然日常政治討論的研究，相當程度受到審議民主理論的啟發 (Eveland et al. 2011; Searing et al. 2007)，兩者也都認為健全的民主體制運作，有賴於公民之間的對話，但前者關心的是坐落在「公共領域」，由正式規則和程序結構所引導的溝通行動，後者關注的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中，非正式的政治討論，兩者之間甚少對話。少數著作討論公共審議和日常政治討論之間的異同 (Conover et al. 2002; 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Huckfeldt et al. 2004; Mutz 2006)，但少有著作探討兩者的連結關係。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公民討論，是否孕育了某些公民心性與能力，鼓勵人們參加正式場域的公民審議？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

日常的政治討論是個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在英文文獻中有些常見的相關用詞，如 *political discussion*, *political talk*, *political conversation*, *sociable conversation*, *civic talk* 等，雖然都泛指人際之間和小團體內

9 參見 Eveland et al. (2011) 的文獻回顧。

部，觸及廣泛政治主題的非正式談話 (Eveland et al. 2011)，但概念的定義範圍並不一致。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日常生活中「觸及廣泛政治主題」的談話，分為兩類：一種是，以政治為主要的談話內容；另一種則是，談論的話題包括各種社會議題，在談論其他話題時才附帶談到政治 (La Due Lake and Huckfeldt 1998; Ikeda and Boase 2011)。在問卷測量方面，類似「當您和朋友、親戚、或同事聚在一起的時候，請問您們常不常談論政治？」這樣的題目，問的是第一種形式的談話；相較之下，「您常不常跟人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問的則是第二種形式的談話。雖然這兩種形式都是廣義的政治討論，為了區別，以下的行文將政治討論 (political discussion) 限定為第一種談話形式，第二種形式則稱為公民討論 (civic talk)。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討論發生的頻率比較低，公民討論則比較頻繁。根據 2014 年所做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到「當您和朋友、親戚、或同事聚在一起的時候，您們常不常談論政治？」，回答「經常」和「有時候」合併只占 22.4%；當問到「過去一年來常不常跟人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回答「常常」和「有時候」的比例，合計達 50%（傅仰止等 2015）。可見公民討論在日常生活中，頗為普遍。國外的經驗研究顯示，不少人可能不喜歡政治、自認不懂政治，或是避免和政治立場不一樣的人發生意見衝突，因此比較少與人直接談論政治 (Wyatt et al. 2000; Zuckerman et al. 2007)。可是人們卻經常在公民討論時，無意地談到政治話題。公民討論常是隨性地展開，往往天南地北，沒有特固定主題；政治話題通常就是在這種不費力氣、隨意交談的社會過程中出現 (Walsh 2004)。例如，當我們和同事聊天，一開始只是聊到念國中的小孩的活動和功課，話題很自然地就帶到令家長困擾的十二年國教政策，談到教育部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基北區高中職入學「超額比序」方式不同調的爭執（林國明 2015），接著就談到柯文哲帶起的政治旋風。許多日常生活的閒聊，就像這樣，一開始並沒有打算要聊政治，政治卻在無意中出現。我們聊很多日常生活的話題，食品安全、交通

治安、空氣品質等，卻沒意識到其實我們在談的，都與政治和政策有關 (Ikeda and Boase 2011)。這種從廣泛的話題不經意地談到政治的公民討論，在日常生活中比直接的政治討論更為普遍，本文因此將觸及政治的談話，限定在公民討論類型。

Jane Mansbridge (1999) 曾經指出日常的公民討論是「審議體系」的構成部分。所謂審議體系，指的是以談話為基礎，透過爭論、示威、表達、說服等各種言說行動，來處理政治衝突、解決集體問題 (Mansbridge et al. 2012)。在審議體系中，坐落在國家制度內部或連結國家決策的政治討論，如議會、各種政府委員會，和本文所關心的政府辦理的公民審議，是被正式規則和結構程序所引導的。但政治對話並不局限在這些正式的、結構化的審議，還包含公民、活躍分子與政治菁英之間，以及公民彼此之間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非正式討論。日常的公民討論，與結構化的審議形式不同，不是那麼秩序井然地講求說理，而是帶有修辭、爭論和情感，說故事也聊八卦 (Young 2000; Dryzek 2000)。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正確地指出，當前的審議民主理論偏好結構化的審議，同時貶低日常公民討論的價值，只因這些非正式的討論形式，不符合審議的規範理想。審議，應是聆聽並回應他人的主張（互惠原則），提出別人能夠信服的理由來說明自己的立場（公共性原則），並在不受權力操縱的平等情境中，運用理性來反思多元的差異觀點（平等原則）。¹⁰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的經驗研究指出，日常公民討論確實與審議的性質不符。在日常生活中談論政治話題時，人們雖然也願意去聆聽、瞭解和尊重他人的意見，但通常不喜歡和不同的意見爭論，覺得沒有必要為自己的想法辯解，也不太關心他人主張背後的理由；人們比較有興趣的，是事實性資訊和他人的經驗，對講道理 (reason-giving) 則興趣缺缺。雖然非結構化、沒有目的、無法影響政策的日常公民討論，不合審議的規範理想，但許多學者都指出，這種談話對民主政治有重要意義。大多數的公民無緣

10 參考 Gutmann and Thompson (1996) 和 Young (2000) 對審議原則的討論。

進入涉及國家決策的正式場域進行審議，卻有很多機會透過日常的公民討論，過濾、肯認或捨棄某些政治的看法，理解政治與公共事務，進而建構民主的公民身分 (democratic citizenship)；沒有日常政治對話構成的公民文化作基礎，民主政治的體質將是孱弱的 (Barber 2003; Conover and Searing 2005; Mansbridge 1999; Walsh 2004)。

當前許多文獻認為日常公民討論是良好的民主政治，甚至是審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理由之一是民主政治需要各種溝通的形式，如 Young (2000) 所言，民主的溝通不能局限在說理的審議模式，也需要表達憤怒與情感的修辭和敘事，來呈現公民們獨特的日常經驗，來理解有權者的作為和他人的生活處境。既有文獻雖承認公共審議與日常公民討論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但除了少數例外，大多都忽略彼此的連結關係。如果公共審議的規範理想，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是值得期待的政治目標，那麼非結構化的日常討論，是否建構了結構化審議的公民參與基礎？

我相信如此。眾多文獻指出，日常的公民討論可以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政治知識，以及在公開場所發言的表達能力，因而促進政治參與。¹¹ 許多民主理論也認為，「知情的公民」是良好的民主體制運作的必要條件；公民必須獲得資訊、瞭解政策與政治對自身利益和社群整體的影響，才能有效地參與政治過程 (Dahl 1989)。但如 Ikeda and Boase (2011) 指出的，人們並不會費心去蒐集政治資訊，而是透過日常交談，以低成本的方式獲得政治資訊，加深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瞭解。Michael Delli Carpini (2004) 進一步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獲得並分享政治資訊的話，比較能夠培養政治效能和政治興趣。一些焦點團體的質性研究和大規模問卷調查，顯示日常的公民討論的確具有這樣的效果。Casey Klofstad (2010) 對大學生進行的焦點團體研究指出，經常與室友討論政治或社會議題，可以刺激思考，引

11 這部分文獻繁多，請參考 Bennett et al.(2000); Eveland (2004); Eveland and Thomson (2006); Mutz (2002a); Searing et al. (2007); Wyatt et al.(2000)。

發自己想去瞭解更多相關事務，因此提高了政治興趣與涉入程度。Verba et al. (1995) 和 Molly Andolina et al. (2003) 的調查研究也指出，常在家庭、學校與人討論政治和社會事務，可以提升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興趣。根據眾多文獻提供的經驗證據，本文假設：日常公民討論能夠提升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而這些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養成，則強化人們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

六、理論的整合

本文中將檢證：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是否會提高人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其間的因果機制，是否是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治知識所造成的？我將把日常公民討論的因果效應，與本文所關切的社團參與和社會不平等的議題連接起來。如果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那麼，我們必須進一步瞭解，什麼因素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社團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否有效應？不同性別和教育程度者，在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上是否有差異？國外 (Jacobs et al. 2009) 和國內 (傅仰止 2014) 的經驗研究都指出，社團參與可以提高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原因已在上面做過討論。這些國內外文獻也顯示，教育程度高的人，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也比較高，性別則無顯著影響。根據這些研究發現，本文假設社團參與和教育程度將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

我將以上幾小節的討論所提出的假設，整合成圖 1 的因果路徑。圖 1 中實線的概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本文核心的理論關切。這個模型，以「公民心性與能力」這組因素為核心，整合社會經濟地位的參與不平等、結社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三部分的觀點，來解釋公民參與公共審議意願的差異。本文假設：不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人群，參與公民審議意願的不平等，主要是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所導致；結社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也透過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養成，影響人們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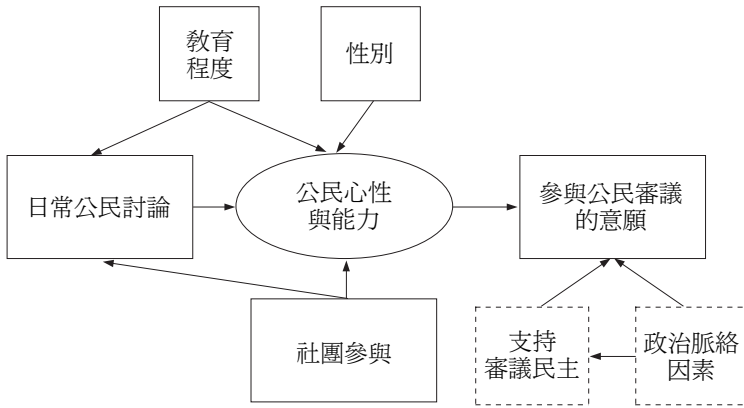


圖 1 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因果路徑

我把這個理論模型，稱為「公民社會論」的審議民主觀點。當前的文獻，或者各自單獨討論公民社會的壯大和審議民主的實踐，對提升民主政治品質的貢獻，或者認為公民社會的抗爭性格與審議民主的說理溝通，存在緊張關係 (Young 2003)。本文的解釋模型則連結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認為公民社會的壯大有利於審議民主的發展。另外，社團參與促進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提高了人們參加公民審議的意願。不過，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受更大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因素所影響，公民社會的茁壯，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擴大，是否能降低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促進更平等的參與？本文的解釋模型，也可以讓我們評估政治平等的原則是否能落實這個核心關切。

七、變項與測量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次（2014年）的公民權問卷；抽樣與問卷設計、調查過程請參見傅仰止等 (2015)。根據前面的討論，本文的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圖 1 的左半部，社經地位、社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和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關聯；釐清這些變項的關係

之後；第二部分則分析哪些因素影響「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以下說明本文所使用的變項。

（一）依變項

本文分析的兩個依變項是「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所用的問卷題目是：「請問您覺得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前，應該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建議讓政府參考？還是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三個答項分別是：「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政策建議」、「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和「無法選擇」。¹² 選擇「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政策建議」答項的占 72.9%，歸為「支持審議民主」；選擇「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決定就好」占 20.7%，歸為「不支持審議民主」；表示「無法選擇」、「不知道」、「不瞭解題意」或「拒答」共占 6.4%，本文的分析排除這部分的資料。

接續以上的題目，問卷調查中問道：「如果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前，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提出建議讓政府參考，請問您會參加嗎？」，本文使用這道題目來測量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本題的答項包括：「一定會參加」、「可能會參加」、「可能不會參加」和「一定不會參加」。我將「一定會參加」和「可能會參加」合併為「有參與意願」，占所有受訪者 52.1%；「可能不會參加」和「一定不會參加」合併為「沒有參與意願」，占 47.1%；另有 0.8% 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或拒答，這部分的資料也在分析中排除。因為兩個依變項都是二元變項，採用邏輯迴歸進行統計分析。

（二）自變項

影響「支持審議民主」和「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因素有四組

12 訪問的時候，出示前兩個答項的提示卡，以幫助受訪者瞭解題意。

自變項：政治脈絡、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以及包含性別、教育程度和政黨傾向的個人特質。根據前面的文獻討論，在「支持審議民主」的分析中，本文感興趣的是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傾向；在「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分析中，則同時評估四組變項的效應。

1. 政治脈絡因素

倡導審議民主通常是為了矯正現行代議民主體制的弊病，本文因而假定對代議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越不滿意、越支持直接民主，越可能支持審議民主，參與審議的意願也較高。對代議制度的信任，應同時包含對政府部門和議會的信任，因此，本文以「您信不信任立法院？」和「您信不信任中央政府？」這兩道題目積分的平均值，測量對代議制度的信任（完全信任 = 1，非常信任 = 2，有點信任 = 3，不太信任 = 4，一點都不信任 = 5）。兩道題目經過信度檢測，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8，表示可以做為測量同一概念的量表。¹³

本文以「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這道題目，測量受訪者對直接民主的態度（非常不同意 = 1，不同意 = 2，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3，同意 = 4，非常同意 = 5）。對民主體制運作現狀的態度，則是採用「目前民主政治在台灣運作的情形是怎樣」這道題目，受訪者對民主政治的運作現狀給予 0 到 10 分的評分；本文的分析採用的計分方式是分數越高，表示對民主現狀的運作越不滿意。

除了以上三項因素之外，我認為，政黨競爭是另一項影響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與參與意願的政治脈絡因素。文獻指出，「政黨惡鬥」使得許多政策議題無法理性討論；社會公眾對政黨失能的不滿使得審議民主的理念得到支持（林國明 2009）。本文以「政黨沒有給選民真正的政策選擇」這道題目，測量民眾對政黨功能的態度（非常

13 Cronbach's alpha 係數是種信度檢測 (reliability test) 的方法，用來估計測量同一概念的多道題目其結果是否具有內在一致性。一般來說，Cronbach's alpha 係數大於 0.7，表示內在一致性是「可接受的」(George and Mallery 2003)。

不同意 = 1，不同意 = 2，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3，同意 = 4，非常同意 = 5)；分數越高，表示對政黨功能越不滿意。

2. 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

在結社參與方面，本文所使用的問卷調查資料，詢問受訪者有沒有加入和參與下面這五種類型的團體：「政黨」，「工會、工商同業公會、職業同業公會」，「宗教團體或教會」，「運動、休閒或文化團體」和「其他自願性社團」。每個團體類型有四個答項：「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和「從未加入過該團體」。本文想要分析社團參與的廣度（類型數目）和深度（積極程度），是否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討論，以及對公民心性與能力所產生的效應，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曾經參加社團，但目前已經不是社團成員的公民，當然可能因為過去參與結社的經驗，而養成特定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或擴大了持續至今、能促進公民討論和政治參與的人際網絡。可是一來，資料中並沒有過去參與社團的時間點，我們無法評估結社參與的效應是否會持續至今；二來，在積極程度方面，只測量了目前參與社團的情況，無從得知過去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基於這些原因，本文界定的社團參與只限於目前有加入團體，而把「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以及「從未加入過該團體」的狀況，都視為沒有參與結社。

在測量社團參與積極程度方面，如果受訪者在任何類型的團體中選擇了「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答項，編碼為 2，視為「積極的社團參與者」。如果沒有任何一類社團「有加入而且積極參與」，但至少有一類社團「有加入但不積極參與」，編碼為 1，視為「消極的社團參與者」。如果「過去加入過但現在已經不是」和「從未加入過該團體」，編碼為 0，視為「沒有參與社團」的對照組。在參加社團的類型數目方面，是將目前有參加的社團類型，無論是積極或不積極參與，給予加總，極大值是 5，極小值是 0；數值越大，表示參加社團的類型數目越多。要提醒的是，本文所測量的是參與團體類型的多寡，而不是參加團體的個數。參加社團類型越多，通常社會接觸的異

質性也越高。符合本文對參與廣度的預設。

日常的公民討論則採用國際通用的問題：「請問您過去一年來常不常跟人（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算）談論社會上發生的事情（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答項及計分方式為：幾乎沒有 = 1，很少 = 2，有時候 = 3，常常 = 4。

3. 公民心性與能力

公民要涉入政治活動、參與公共事務，應該具備一些起碼的心理動機和實踐技能，例如，認為自己的行動能帶來改變、對政治有興趣、對政治體系有所瞭解，以及能夠與人溝通的表達能力(Comber 2003)。我把文獻中最常提到的四個因素，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影響人們涉入政治的心理動機和實踐技能，統稱為公民心性與能力。本文假定，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較高的人，比較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我進一步假設：社會經濟地位變項（教育及性別）、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與類型數目，以及日常公民討論，主要是透過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政治效能感的測量採用問卷中的兩道問題：「像您這樣的人，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以及「您認為政府不在乎像您這樣的人的想法」。答項及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 = 1，同意 = 2，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3，不同意 = 4，非常不同意 = 5。這兩道題目是國際上用來測量政治效能感的標準化問題，測量的是所謂的「外部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指的是對於政府當局是否會回應公民要求的看法(Acock et al. 1985; Niemi et al. 1991)。¹⁴ 兩道題目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7435，我因此將兩道題目的平均分數做為政治效能感的測量值。

14 內部政治效能指的則是對政治體系運作的瞭解。在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對政治效能感的測量，一般都著重在外部政治效能，至於對政治體系的瞭解，則是建構事實性知識的題組，以測量客觀的「政治知識」（參見 Verba et al. 1997）。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對於與內在政治效能感有關的政治知識測量，是請受訪者主觀比較自己和其他人對政治的瞭解程度。請見下文對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說明。

政治興趣所使用的問項是：「請問您個人對政治有沒有興趣？」（一點也沒有興趣= 1，不太有興趣= 2，還算有興趣= 3，很有興趣= 4）。公民能力所測量的都是主觀能力的評估。表達能力使用的問項是：「如果您需要向政府官員或是民代陳情，請問您覺得您有沒有能力表達您要陳情的內容？」（完全沒能力= 1，沒有能力= 2，有能力= 3，非常有能力= 4）。政治知識使用的問項是：「您認為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比您更知道政治與政府的事？」（非常同意= 1，同意= 2，不同意= 3，非常不同意= 4）。

4. 社會經濟地位與政黨認同

本文關切的主題之一，是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有所差異。本文將分析性別（男性= 1）和教育程度兩個變項的效應。¹⁵ 性別與教育程度之外，收入是另一個最常被提及，會影響政治參與程度的社經地位變項。但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家庭收入的缺失值高達 533，占全部樣本數的 28.48%，由於缺失值過多，只得放棄收入變項。

本文認為在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下，政黨傾向會影響對公民審議的態度。政黨傾向採用的問項是：「國內的政黨都有他們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回答「國民黨」、「新黨」、「親民黨」和「泛藍」的受訪者合併為「泛藍支持者」，編碼為 2，「民進黨」、「台聯」和「泛綠」的受訪者合併為「泛綠支持者」，編碼為 1；回答其他選項者，則做為泛藍和泛綠支持者的對照組，編碼為 0。

（三）控制變項

除了以上的變項，本文的分析控制其他變項：年齡、婚姻狀況（已婚= 1）、工作狀況（有全職工作= 1）和都市化程度。¹⁶ 這些變

15 教育程度的編碼為：國小或以下=1，國初中=2，高中職=3，專科=4，大學或以上=5。

16 選項為：獨立農家／農村地區=1、小城鎮=2、大都市旁的郊區=3、都市=4。分數越高，表示都市化程度越高。

項可能影響公民意識（傅仰止 2014）和公民參與（Schlozman 2002），進而對審議民主的支持和參與意願、日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產生效應，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加以控制。各變項的描述統計摘要請見表 1。

（四）分析方法

根據圖 1 的因果路徑，本文的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性別、教育程度及社團參與對日常公民討論的效應，以及性別、教育程度、社團參與及日常公民討論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這部分的分析，採用最小平方多元迴歸。第二部分分析人口特徵與社會經濟地位、政治脈絡因素、社團參與及日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對「支持審議民主」、「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的影響。這部分的依變項為二元變項，因此採用邏輯迴歸。

八、日常公民討論、 社團參與和公民心性能力

本文關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存在社會不平等，以及，是否受參加社團和日常公民討論所影響。根據前面的理論討論，本文假設：公民心性能力是影響人們是否願意參與公民審議最關鍵的因素；社會經濟地位、社團參與，以及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主要是透過公民心性能力的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另外，社會經濟地位和社團參與，也透過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路徑，造成公民心性能力的差異。在檢證社會經濟地位、社團參與、公民討論和公民心性能力，這四組變項是否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之前，以下先分析這些自變項的關係。

表 2 有九個模型。模型 1 在控制相關變項下，評估社會經濟地位因素，以及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與積極程度，是否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前面的文獻討論曾經指出，社團經常是背景相似、志趣相投

表 1 所有變項的描述統計

變項	N	平均數	標準差	最低值	最高值
是否支持審議民主	1755	0.78	0.42	0	1
是否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1860	0.53	0.50	0	1
人口特徵與社會經濟地位					
性別（男）	1875	0.50	0.50	0	1
年齡	1873	46.47	17.37	19	97
婚姻狀況（已婚）	1875	0.59	0.49	0	1
教育程度	1872	3.28	1.49	1	5
工作狀況（有）	1873	0.60	0.49	0	1
都市化程度	1867	2.67	1.09	1	4
政黨傾向					
中立選民	1,224 (65.63%)				
泛藍	354 (18.98%)				
泛綠	287 (15.39%)				
政治脈絡因素					
對代議體制的信任	1768	3.57	0.75	1	5
政黨功能	1654	3.64	0.97	1	5
直接民主	1737	3.65	1.06	1	5
民主體制的不滿	1758	4.63	2.29	0	10
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					
參加社團數目	1875	0.82	0.91	0	5
參加社團頻率					
沒有參與	829 (44.24%)				
消極參與	582 (31.06%)				
積極參與	463 (24.71%)				
日常公民討論	1874	2.43	0.97	1	4
公民心性與能力					
政治效能	1815	2.71	1.10	1	5
政治興趣	1857	1.76	0.82	1	4
表達能力	1844	2.49	0.83	1	4
政治知識	1783	2.89	1.09	1	5
樣本數=1875					

的人所組成，很容易在參與社團的言說互動中，聊起共同關心的話題而不經意地觸及政治事務。但究竟是參與深度還是廣度比較能促成日常的公民討論，「社會化理論」和「動員論」有不同的解釋。社會化理論認為，積極參與社團能增加社會互動的機會，會提高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動員論認為，和同個社團的成員重複互動，不見得能增加討論公共議題的機會，反而是參加多個不同類型的社團，能擴大異質性的人際網絡，增加社團參與之外的社會接觸，比較能夠創造更多公民討論的互動情境。本文的發現，傾向支持動員論。參加社團類型數目越多的人，與人討論政治社會議題的頻率也越高；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對日常公民討論則無影響。社團參與之外，就本文關心的變項而言，教育程度也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比較常與人討論公共議題。性別在日常公民討論方面，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與本文的假設符合。

表 2 有四個模型，是在控制相關變項的條件下，評估性別、教育程度和社團參與對政治效能（模型 2）、政治興趣（模型 4）、表達能力（模型 6）、政治知識（模型 8）的影響，另有四個模型（模型 3、5、7 和 9）則在上述自變項之外加入日常公民討論。在社團參與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方面，文獻普遍認為社團參與可以養成積極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因而提高政治參與的意願和程度，例如，社會化理論認為，積極參與社團者能從頻繁的社會互動和協力合作的經驗，學習到參與政治的動機與能力；動員論則認為，公民心性與能力經常是在社團參與之外的環境中習得的，廣泛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所創造的人際網絡，使人們有機會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與社會互動，並且從中養成了公民心性與能力。本文在這方面的發現，大致支持動員論。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對四項公民心性與能力，並無顯著影響。¹⁷ 但參與較多類型社團的民眾，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也比較

17 社團參與頻率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影響，唯一有顯著的是模型 8；不過，沒有參加社團的人，相較消極參加社團的人，反而有較強的政治效能感。

表 2 日常公民討論、社團參與和公民心性能力的迴歸分析

變項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公民討論 政治效能	政治效能 政治興趣	政治效能 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	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	政治知識 政治知識	政治知識 政治知識
性別	0.0230 (0.0411)	-0.0337 (0.0519)	-0.0356 (0.0517)	0.185*** (0.0372)	0.180*** (0.0356)	0.162*** (0.0340)	0.157*** (0.0340)	0.160** (0.0488)	0.158** (0.0484)
年齡	-0.00866*** (0.00171)	-0.00281 (0.00219)	-0.00189 (0.00219)	0.00151 (0.00156)	0.00378* (0.00150)	0.00210 (0.00146)	0.00355* (0.00144)	0.0113*** (0.00205)	0.0125*** (0.00205)
已婚	0.103* (0.0457)	-0.118* (0.0584)	-0.130* (0.0582)	-0.0629 (0.0416)	-0.0906* (0.0400)	0.0550 (0.0386)	0.0372 (0.0378)	0.0606 (0.0546)	0.0461 (0.0543)
教育程度	0.149*** (0.0193)	0.0289 (0.0244)	0.0118 (0.0247)	0.0996*** (0.0175)	0.0609*** (0.0170)	0.223*** (0.0164)	0.197*** (0.0164)	0.298*** (0.0230)	0.277*** (0.0232)
有工作	0.131** (0.0458)	-0.0813 (0.0579)	-0.0958 (0.0578)	-0.0941* (0.0414)	-0.128** (0.0398)	0.0948* (0.0387)	0.0716 (0.0380)	-0.0647 (0.0544)	-0.0816 (0.0541)
都市化程度	0.0519** (0.0195)	-0.0333 (0.0247)	-0.0391 (0.0247)	0.0687*** (0.0177)	0.0556** (0.0170)	0.0293 (0.0165)	0.0202 (0.0162)	0.0645** (0.0233)	0.0573* (0.0232)
參加社團數目	0.130*** (0.0387)	0.0968* (0.0485)	0.0824 (0.0484)	0.0975** (0.0350)	0.0625 (0.0336)	0.0878** (0.0326)	0.0659* (0.0320)	0.0400 (0.0454)	0.0220 (0.0452)
參加社團頻率 (消極 vs 沒參加)	0.0353 (0.0685)	-0.166 (0.0865)	-0.171* (0.0862)	0.0545 (0.0620)	0.0473 (0.0594)	0.00568 (0.0578)	0.000312 (0.0566)	0.0616 (0.0812)	0.0573 (0.0806)
參加社團頻率 (積極 vs 沒參加)	0.0896 (0.0833)	0.0510 (0.105)	0.0404 (0.105)	0.0145 (0.0752)	-0.00800 (0.0721)	0.103 (0.0704)	0.0869 (0.0689)	0.123 (0.0985)	0.110 (0.0978)
日常公民討論			0.118*** (0.0294)		0.260*** (0.0202)		0.171*** (0.0193)		0.144*** (0.0275)
常數	1.919*** (0.130)	2.929*** (0.165)	2.701*** (0.174)	1.079*** (0.118)	0.578*** (0.120)	1.310*** (0.111)	0.986*** (0.114)	1.038*** (0.155)	0.758*** (0.163)
樣本數	1,858	1,803	1,803	1,844	1,843	1,830	1,829	1,774	1,774
R-squared	0.188	0.022	0.030	0.082	0.158	0.217	0.249	0.136	0.150

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0.01, ** p<0.1, * p<0.05

高。不過，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對政治知識並無顯著的影響，原因可能是，本文所測量的政治知識是主觀的，是與他人的比較。參加社團數目比較多的人，有可能增加了實際的政治知識，而自認比其他人更瞭解政治和政策，但也有可能是接觸到許多見多識廣的人，而認為其他人比自己更瞭解政治。

前面的討論曾經提到，社團參與對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有部分作用是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越多，越能擴大日常公民討論，因而提高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與表達能力。模型 1 的結果顯示，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越多，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也越高。我於是在模型 3、模型 5、模型 7 和模型 9 加入日常公民討論這個變項，並分別與模型 2、模型 4、模型 6、模型 8 比較，評估社團參與的效應是否減弱或消失。結果發現，加入日常公民討論之後，社團參與數目對表達能力的效果稍有減弱，但仍舊顯著；對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興趣的效果則變得不顯著。我們大致可以說，社團參與能夠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而影響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¹⁸

從表 2 的模型 3、模型 5、模型 7 和模型 9 可以發現，如本文理論所預期的，日常公民討論確實有助於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常和別人討論政治社會事務的人，政治效能感比較高、對政治比較有興趣，也自認為有表達能力並瞭解政治與政策。表 2 的模型 2 到模型 9 也顯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某些公民心性與能力方面，確實存在差異。性別和教育程度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沒有明顯差異，但男性及教育程度高的人，對政治比較有興趣，也比較自認為有表達能力並瞭解政治與政策。雖然社團參與數目和日常公共討論可以提高人們的公民心性與能力，但是本文發現，在社團參與數目和日常公共討論頻率相當的情

18 社團參與數目雖不影響政治知識，但日常公民討論則有影響，可能是因為在日常公民討論中，人們所接觸的大多是朋友、同事、親戚、鄰居，不像社團參與會接觸到比較多關心實際政治的人，因此日常公民討論比較頻繁的人，主觀上比較可能認為自己對政治的理解比其他人多。感謝洪晨碩對這部分的解釋提供很有價值的建議。

況下，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面向上的差異，依然顯著存在。

總的來說，表 2 顯示性別、教育程度、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日常的公民討論，這四個變項對公民心性能力的部分變項或全部變項都產生作用；另外，教育程度和社團參與類型數目會影響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分析結果大致符合圖 1 左半部因果路徑的假設。接下來，我們要看這些變項是否影響台灣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以下先說明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再分析參與意願。

九、解釋公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與參與意願

台灣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比例非常高。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七成的民眾認為，政府在決定重大政策前，應該先召開會議讓一般民眾來討論，並提出建議供政府參考；只有兩成的民眾，認為應該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做決定就好。不僅公民審議獲得廣大的社會公眾支持，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也很高。當被問到是否會參加政府召開的公民審議會，有五成二的民眾表示有意願參加，四成七表示沒有意願。至於不願意參加的原因，依比例高低順序為：「對公共政策議題沒有興趣」(26%)、「沒有時間」(24.8%)、「對公共政策議題不瞭解」(18%)、「參加這種會議沒有用（無法影響決策）」(16.0%) 和「比較不會講話」(8%)。除了時間這個資源因素之外，其他因素都與公民心性與能力有關。

對公民審議的支持和參與意願，兩者有顯著的正相關，如附錄的卡方檢定所示。與本文的預期相符，支持公民審議的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比較高。我對影響社會公眾支持公民審議和參與意願的因素進行邏輯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於表 3。表 3 列出五個模型，模型 10 的依變項是支持審議民主，模型 11 到模型 14 的依變項是願意參與公民審議，逐步放入本文理論感興趣的自變項來評估其效應。模型 11 的

自變項包括人口特徵、社會經濟地位、政黨傾向和政治脈絡因素，模型 12 加入社團參與的廣度與深度，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模型 13 再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模型 14 最後放入支持審議民主。以下說明分析結果。

（一）政治脈絡、政黨傾向與公民審議

模型 10 顯示，除了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傾向之外，只有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興趣影響民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與理論預期相符，對民主體制越不信任、對政黨提供的政策選擇功能越不滿意、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評價較低，以及越具有直接民主信念的民眾，比較支持公民審議。林國明(2009: 172)分析公民審議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時曾經指出，「如果社會公眾對代議制度的運作普遍不滿，認為民選政治人物無法代表民意……不能審慎決策，這種公共態度可能擴大替代性民主的想像」，強化公民審議的吸引力。本文以問卷資料的統計分析，確認上述觀點在經驗上是可信的。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公眾對公民審議的廣泛支持，是根源於特定的政治脈絡。在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中，對中央政府「不信任」的比例，達 46.1%¹⁹；對立法院不信任的比例為 51.3%。高達六成五的民眾，認為「政黨沒有給選民真正的政策選擇」，而同意「公民投票是解決重要政治問題的一個好方法」的比例，達 66.2%。民眾對代議制度和政黨體系運作的普遍不滿，以及對直接民主的要求，孕育了支持公民審議的態度。

政黨傾向也影響社會公眾對公民審議的支持。相較於「不藍不綠」的「中立」選民，泛藍的支持者比較不支持公民審議。但是，泛綠支持者和「中立」選民對公民審議的支持傾向則無顯著差異。此項結果與本文的假設部分相符。泛藍的支持者比較「菁英」取向，傾向於主張由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專家來決定政策就好，但泛綠的支持

19 包括「有點不信任」和「非常不信任」。回答「完全信任」、「非常信任」和「有點信任」合計為 47.1%。

表 3 支持和參與公民審議意願的邏輯迴歸

變項	支持審議民主 (對照組=不支持)		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對照組=沒有意願)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性別 (1=男性)	0.128 (0.135)	1.137	0.234* (0.105)	1.264	0.242* (0.107)	1.274	0.0811 (0.117)	1.084	0.000132 (0.122)	1.000
年齡	-0.00270 (0.00592)	0.997	0.00740 (0.00472)	1.007	0.00920 (0.00486)	1.009	0.00314 (0.00539)	1.003	0.00520 (0.00562)	1.005
已婚 (1:已婚)	-0.126 (0.155)	0.882	-0.148 (0.121)	0.862	-0.249* (0.124)	0.780	-0.192 (0.136)	0.825	-0.187 (0.142)	0.830
教育程度	0.0278 (0.0676)	1.028	0.230*** (0.0500)	1.259	0.166** (0.0516)	1.180	-0.0183 (0.0592)	0.982	-0.0238 (0.0615)	0.976
有全職工作	0.235 (0.151)	1.265	0.0746 (0.115)	1.077	0.0455 (0.119)	1.047	0.199 (0.131)	1.220	0.172 (0.136)	1.187
都市化程度	-0.0465 (0.0651)	0.955	0.00691 (0.0504)	1.007	-0.0163 (0.0517)	0.984	-0.0730 (0.0566)	0.930	-0.0650 (0.0587)	0.937
支持泛藍 (參考組: 中立選民)	-0.514** (0.165)	0.598	0.286* (0.141)	1.331	0.195 (0.145)	1.215	0.0549 (0.157)	1.056	0.201 (0.165)	1.222
支持泛綠 (參考組= 中立選民)	-0.0188 (0.207)	0.981	0.289* (0.147)	1.336	0.171 (0.151)	1.187	-0.178 (0.172)	0.837	-0.211 (0.177)	0.810
對代議制度的 信任	0.309** (0.100)	1.362	0.0810 (0.0775)	1.084	0.0664 (0.0794)	1.069	0.153 (0.0878)	1.166	0.105 (0.0908)	1.111
政黨功能	0.223** (0.0694)	1.250	0.214*** (0.0552)	1.238	0.205*** (0.0567)	1.227	0.247*** (0.0632)	1.280	0.239*** (0.0661)	1.270
直接民主	0.389*** (0.0614)	1.476	0.0601 (0.0496)	1.062	0.0527 (0.0508)	1.054	0.0533 (0.0558)	1.055	-0.0389 (0.0589)	0.962
民主現狀的 不滿	0.0923** (0.0318)	1.097	-0.00541 (0.0240)	0.995	-2.64e-05 (0.0246)	1.000	0.0100 (0.0269)	1.010	-0.000831 (0.0280)	0.999
參加社團數目	-0.0466 (0.119)	0.954			0.254* (0.105)	1.290	0.224 (0.114)	1.251	0.213 (0.119)	1.237
消極參加社團 (參考組= 未參加)	-0.0454 (0.216)	0.956			-0.199 (0.180)	0.820	-0.319 (0.197)	0.727	-0.287 (0.204)	0.750
積極參加社團 (參考組= 未參加)	0.0290 (0.268)	1.029			0.0701 (0.220)	1.073	-0.0253 (0.241)	0.975	0.0263 (0.251)	1.027
日常公民討論	0.0144 (0.0810)	1.014			0.369*** (0.0629)	1.447	0.129 (0.0702)	1.137	0.138 (0.0727)	1.148
政治效能	0.208** (0.0657)	1.231					0.177** (0.0560)	1.194	0.150* (0.0582)	1.162
政治興趣	0.147 (0.0916)	1.158					0.809*** (0.0828)	2.246	0.834*** (0.0857)	2.302
表達能力	0.0769 (0.0942)	1.080					0.444*** (0.0832)	1.558	0.451*** (0.0863)	1.570
政治知識	0.0359 (0.0665)	1.037					0.259*** (0.0573)	1.296	0.260*** (0.0594)	1.297
支持審議民主									1.301*** (0.157)	3.671
常數	-3.331*** (0.722)	0.0358	-2.335*** (0.502)	0.0968	-3.032*** (0.527)	0.0482	-5.542*** (0.657)	0.00392	-6.068*** (0.686)	0.00232
樣本數	1,516		1,586		1,586		1,542		1,516	
Pseudo R ²	0.0808		0.0322		0.0611		0.1585		0.1946	

註：表內數字為邏輯迴歸係數 b，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粗體數字為勝算比(odds ratio)。

*** p<0.001, ** p<0.01, * p<0.05

者不見得比較支持公民審議。

四項政治脈絡因素中，只有對政黨功能的態度這項因素，影響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Neblo et al. (2010) 指出，正面的政治價值（如支持直接民主），不見得能鼓勵人們參與政治活動，可是對現行政治體系運作的不滿，卻往往可以激發人們的參與意願。但公眾的不滿，必須是針對特定制度運作，而非是漫散、不明確的，否則無法產生激勵參與意願的效果。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中，民眾對政黨的功能高度不滿，普遍認為政黨不能提供民眾政策選擇；民眾對政黨的不滿程度，遠高於對行政和立法部門的不信任。可能是這種特殊的脈絡因素，使得「對政黨功能的態度」影響民眾的參與意願。

具有政黨認同的人，政治態度往往比較積極，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會比較高。在表 2 模型 2 中可以發現，相較於中立選民，泛藍和泛綠的支持者比較願意參與公民審議。但是，當我們控制社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這些和公民積極性有關的因素之後，政黨傾向的效應就已消失（模型 3 和模型 4），可見關鍵因素是公民積極性，而非政黨傾向本身的作用。

以上說明政治脈絡與政黨傾向對支持公民審議和參與意願的影響，但這並非本文關切的焦點。本文所關注的，是社經地位、社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對公民審議參與意願的影響。以下說明這部分的研究發現。

（二）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效應

從模型 11 和模型 12 可以發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存在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模型 11 控制其他人口特徵、政治脈絡因素和政黨傾向，結果顯示男性和教育程度比較高的民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較高。模型 12 加入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的變項之後，由於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效果，教育程度對參與意願的效應減弱，但依然顯著，性別的效應也依舊存在。也就是說，在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和積極程度，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相當的情況下，男性和教育程度比

較高的人，還是比較有意願參與公民審議。可是，當我們在模型 13 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因素之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效果就變得不顯著了。前面的分析結果已經指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這些變項上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說，性別和教育程度在參與意願上的效應，應該是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所造成的。

（三）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的效應

從模型 12 可以發現，參加較多類型社團的人，比較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但與沒有參加社團的人比較，不論是積極參與或消極參與社團者，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並無顯著差異。這個發現較為支持「動員論」的理論假設，與表 2 所呈現的社團參與和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關係相呼應。也就是說，參加類型社團較多的人，受動員網絡的影響而涉入較多的政治活動或社會互動，並從這些行動中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提高了參與意願。因此，當模型 13 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的變項之後，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影響參與意願的效應就變得不顯著了（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也不顯著）。我們可以說，參加較多類型的社團，是透過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中介作用，進而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模型 12 顯示，如本文假設所預期的，日常公民討論會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比較常跟人討論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民眾，比較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前面的分析指出，日常公民討論會形塑公民心性與能力，因此，當模型 13 中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之後，日常公民討論的效應就消失了。這個結果符合本文的理論推理：日常公民討論和社團參與一樣，都是透過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因果機制，進而影響了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四）公民心性與能力

本文測量四項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

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從表 3 的完整模型可以看出，四項因素都顯著地影響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政治效能感越高、對政治越有興趣、越不認為別人對政府和政策的事懂得比自己多，以及越是自認表達能力好的人，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也越高。四項因素中，政治興趣的效應最大。這個分析結果與本文的假設吻合：公民心性與能力是影響參與意願最關鍵的因素，當加入公民心性與能力的變項後，性別、教育程度、社團參與的類型數目，以及日常公民討論等原先影響參與意願的因素，其效應都變得不顯著了。

（五）支持審議民主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以上是根據模型 10 到模型 13 的分析結果，討論社會經濟地位（性別與教育程度）、結社參與、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四組變項的效應。模型 14 加入「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如原先的假設所預期的，支持審議民主的人，比較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比較模型 13 和模型 14，可以發現，加入「支持審議民主」這個變項之後，並不影響其他自變項原先的顯著程度。從模型 14 也可以看出，對審議民主支持程度相同的人來說，對政黨功能較不滿意，以及公民心性與能力較強的人，比較願意參與公民審議。

綜合表 2 和表 3 的結果，本文發現，志願結社和日常公民討論，可以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進而提升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許多文獻指出，志願結社、非正式的公民討論，以及正式的公民審議，這三者都有助於民主體制的良好運作，本文首度將三者的關係作了連結。社團參與透過養成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促進日常生活的公民討論，提高了人們願意參加正式的公民審議的機會。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公民討論，也能夠提升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表達能力和政治知識，促使人們願意參與正式的公民審議。我們可以說，活絡的公民社會和日常的公民對話，孕育積極公民的蓬勃生機，厚植審議民主的公民文化基礎，強化社會公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公民社會的茁壯與日常公民討論的擴大，帶來了強化公民審議正

當性的樂觀希望，但參與不平等的疑慮，是確實存在的現實。本文的研究發現，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受到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影響，而某些公民心性與能力的面向，存在著性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因而造成不平等。社團參與和日常公民討論，並無法消弭性別和教育程度在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和表達能力等關鍵因素的差異。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民心性與能力方面所呈現的不平等，受到廣泛的社會結構與過程所影響而頑固地存在，這是強調平等原則的審議民主在實踐上必須面對和克服的問題。

十、討論與結論

審議民主實踐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如何制度化地將公民審議整合到決策過程，以產生實際的政策影響力。公民審議能否產生政策影響力，一個關鍵因素是政府所辦理的公民審議，能否得到廣大社會公眾的支持並體現平等參與的原則。而誰願意來參與審議，則探問審議實踐能否落實平等原則。可惜的是，既有文獻幾乎都沒有探究對政府所發動、意圖影響政策的公民審議，一般民眾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如何。

本文以全國性的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社會公眾對政府發動的公民審議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在審議民主的研究文獻中，可說是創新的研究。本文發現，公民審議在台灣有廣大的民意支持。七成以上的受訪者，支持政府在政策決定前辦理公民審議活動，讓一般民眾來討論政策議題並提供政策建議。本文的分析指出，公民審議在台灣之所以獲得廣泛的公眾支持，起源於特殊的政治脈絡。倡議審議民主，經常是為了矯正現行代議民主體制的弊病；民眾對民主體制的運作現狀的不滿、對代議體制（中央政府與立法院）的不信任、對直接民主的渴求，匯聚了支持審議民主的公眾態度。這些政治脈絡因素是國際文獻所預期的，但有個因素卻被文獻所忽略：政黨競爭狀態。台灣的政黨競爭常被批評為「只問藍綠，不問是非」，無法提供選民政策選

擇。本文發現，對政黨競爭的不滿，增強了社會公眾支持公民審議，也提高民眾參與公共審議的意願。除了政治脈絡因素之外，政黨傾向也影響對公民審議的支持。泛藍的支持者，和中立選民相較，支持公民審議的可能性較低。事實上，是否為泛藍支持者，是所有影響支持審議民主的因素中，效果最為顯著的。為何泛藍支持者傾向於反對審議民主？這值得進一步討論。有些本文沒有納入分析模型的民主價值，也可能影響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態度。審議民主主張自由平等的公民透過討論的方式來影響政策；人們如果對民主體制本身有比較強的支持信念，或比較支持公民意見的自由交換，比較可能支持審議民主的理念。過去的經驗研究顯示，與泛綠的支持者相較，國民黨或泛藍的支持者比較不同意「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這樣的觀念，也傾向認為「民主制度比較不適合台灣」（吳親恩 2007）；與中立選民相較，國民黨支持者傾向認為「大家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會很亂」（盛治仁 2003）。可能因素包括泛藍支持者具有威權心態、缺乏支持自由多元原則的民主價值，使他們傾向於反對審議民主。

社會公眾雖然高度支持審議民主，但公眾態度如何影響政府對公民審議的推動，需要更複雜細緻的解釋。林國明(2009)的研究指出，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央政府曾經大力推動審議民主，主要因素之一，是民進黨政府在「少數執政」的困境中，從輿論中察覺到審議民主具有社會支持力量，因此策略性援引公民審議來突破決策僵局。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在同時掌握國會多數的優勢下，反對公民審議理念的執政菁英，不再熱衷推動公民審議。由於政府對審議民主的推動受到政治制度運作特質和國家社會關係等複雜因素的影響（林國明 2009），本文雖然發現公民審議具有廣泛的公眾支持，但不宜樂觀地認為公民審議的制度化，會因為具有「民意基礎」而顯得容易。

是否支持審議民主，影響到民眾參與審議的意願；但本文的核心關切是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否存在社會不平等，是否受到參加志願結社和日常公民討論的影響？本文在這方面的分析視野和發現，有非

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涵。

當代民主體制的運作引起許多批評與不滿，如何矯正代議民主的弊病？當前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民主實踐，有兩大主張。「社會資本論」認為廣泛參與志願結社，能夠鍛鍊公民的政治技能，養成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心性，因此，「壯大公民社會」，可以創造積極活躍的公民社群，提升民主政府的表現。「審議民主論」則主張，廣納公民參與對話，使各種衝突的利益和觀點得到公平、周延的考量，政府的政策才能妥善回應複雜、多元的民意，提升決策品質與正當性。到目前為止，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的文獻，甚少對話。有些討論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關係的文獻認為，倡議特定利益與價值、強調抗爭策略行動的公民社會團體，與「溫良恭儉讓」、講求「理性溝通」的公民審議，調性不合，並且呈現緊張關係 (Young 2001; Dryzek 2000)。少數文獻雖認為公共審議的運作，需要公民社會的基礎 (Habermas 1996; 林國明 2013)，但沒有關照到公民社會如何孕育支持公共審議運作的微觀基礎。本文的分析將參與結社所構成的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和審議民主做了連結，指出參與結社所鍛鍊的公民心性與技能，促成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在分析上做這種微觀層次的連結，是本文重要的貢獻。

本文發現，參與社團的類型越多，越可能培養公民心性與能力，也能提高參與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這點結論與傅仰止 (2014) 的發現相同，但傅仰止並沒有比較參與社團的類型數目和頻率的相對效應。此外，本文也發現，參與較多類型的社團，比較可能培養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但參與社團的積極程度則沒有影響。本文的發現支持「動員論」而非「社會化」理論的觀點。何以如此？這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熊瑞梅比較東亞四國民眾的結社參與情形發現，相較於日本和韓國，台灣民眾參與結社的比例偏低，而且主要是參與宗教團體 (12.1%) 和康樂性團體 (11.21%)；民眾參與政治團體的比例非常低，只有 1.69%，顯示「臺灣民眾似乎對於透過參與政治團體，來進行有組織

地監督政府的機制並不熱衷」（熊瑞梅 2014: 8）。一些批評「社會化」理論的文獻指出，社團參與如果要產生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效應，關鍵因素不是參與的積極程度，而是參與社團的類型 (Alexander et al., 2012, Wollebæk and Strømsnes 2008)。他們認為，社團參與和政治參與之間並無社會化機制的因果連結，兩者的關聯是「自我選擇」的機制和網絡動員造成的；人們是在社團參與以外的領域，如工作場所、學校、家庭、媒體環境等，學到公民技能和價值；而具有特定能力和價值傾向的人同時參與了社團與政治行動，造成兩者的關聯。Dag Wollebæk and Kristin Strømsnes (2008) 指出，宗教性和康樂性社團經常「迴避政治」，參與這類社團並不能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²⁰ 參與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工會等公益性或倡議性組織，才有影響效果。在台灣，積極參與社團者沒有更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可能是因為他們大都參加「沒有效果」的團體類型。不過，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對社團類型的分類過於粗糙，缺乏對政治性與倡議性團體做更細緻的分類，因此無法探討類型的差異。本文發現，參加較多類型社團的民眾，有較強的公民心性與能力，原因可能是：第一，他們比較有機會參加可以鍛鍊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公益性或倡議性社團；第二，他們連結到更多動員的網絡，參與了社團外的政治活動與公共事務，進而養成了公民心性與能力。

既有文獻也忽略正式的公共審議與非正式的日常公民對話之間的關係。目前審議民主的經驗研究有著「程序主義」的偏見，關心人為設計的、正式規則引導的公共討論發生的條件與後果，但忽視日常生活中非正式的公民對話所具有的民主意涵。如果審議民主的理想，是透過溝通行動使決策者提出足以讓公眾信服的理由來為政策決定辯

20 一位審查人指出「台灣許多宗教團體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傾向的，只是它們平時是以『迴避政治』（不談政治）的措辭在對應政治，但在關鍵時刻，它們還是顯露出特定傾向，支持特定候選人等等。」感謝審查人的提醒，但是，即使宗教團體有特定政治傾向，會支持特定候選人，如果平時的社會互動是迴避政治的話，那是無法養成公民心性與能力的。要提醒的是，這裏是從國外的經驗研究文獻來推測台灣的狀況，至於台灣的宗教性和康樂性社團，有多大程度是「迴避政治」的，仍有待經驗檢證。

護，那麼，溝通行動就不能只局限於正式場域 (Young 2000)。在日常閒聊的政治討論中，人們嘲諷政治人物、批評時政、討論決策者的作為，形成對政治與公共政策的看法，也發展了公民的身分意識。許多關注日常政治討論的研究雖然指出這種談話形式的民主意涵，卻忽視非正式的公民討論對正式審議的促進作用。本文指出，日常公民討論可以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因而激勵人們願意參與公共審議。雖然，邏輯上有可能是公民心性與能力，同時提高人們參與日常公民討論的頻率和參與正式審議的意願。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缺乏貫時性 (longitudinal) 的面向，不易判定日常公民討論與公民心性能力的因果方向，但是，如前面的文獻回顧所指出的，既有眾多文獻，包括 Klofstad (2010) 所做的長期追蹤調查 (panel study)，已經以堅實的經驗證據闡明，日常公民討論確實能提升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和表達能力。本文在這個因果命題上，進一步將日常公民討論、公民心性與能力，和參與正式公民審議的意願做分析的連結，這是本文另一個重要的貢獻。

本文也同時連結了結社參與、日常公民對話和公共審議三者的關聯。社會資本論強調結社參與可以養成積極的公民心性與能力，不少文獻也認為參與結社可以促進日常的公民對話，但都忽略了結社參與可以透過日常公民討論的中介作用，提升有利於政治參與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指出這種因果路徑能夠提高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是本文的重要貢獻。本文將這些研究領域進行分析的連結，有重要的實踐意涵。參與結社對民主的重要價值，不僅在於壯大公民社會，養成民主體制的良好運作所需的積極公民，更能在日常生活的層次，透過公民討論建構公民審議的公民文化基礎。如果公共審議制度化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廣大的社會公眾具有參與審議的意願，那麼，公民社會的壯大，使公民們參與更多類型的自願結社，將能促進廣泛的公民參與意願，進而有利於建構公共審議的正當性基礎。

就「政治平等」的關切來說，本文的分析具有一些限制。本文分析的是參與的意願，意願是實際參與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雖

然有半數以上的民眾具有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但我們對此不宜過度樂觀。畢竟，有意願的人是否會實際出現在審議的場合，還受到資源、管道的限制，我們不能忽略這方面的現實障礙。

即使關注參與意願，本文也指出公民審議制度化所面臨的可能障礙。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使得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上，呈現不平等的現象。正是因為注意到這樣的不平等，使得有些批評者反對公民審議的制度化，認為由公民審議來決定政策，違反「政治平等」的原則而不具民主正當性。關於這種反對意見，有兩點值得討論。首先，將公民審議整合到政策決定過程來影響政策，並不意味公民審議的結果具有法定的約束力 (legally binding)。如哈伯瑪斯 (Habermas 1996) 所言，公共審議所創造的是公共輿論的「影響力」，而非「權力」；代議民主所選出的行政與立法部門，仍具有決策權力以回應「制度化的公共領域」所產生的公民意見。審議的不平等，固然降低公民審議的影響力和正當性，但因公民審議不具法定決策權力，審議的制度化並不需要以「完全的參與平等」的理想狀態為先決條件。其次，代議民主的運作原本就存在參與的不平等；審議民主的實踐，考慮到參與不平等的現實，因此在程序設計上，透過多重方式來降低不平等，使審議民主的實踐比傳統政治更具包容性 (Fung 2003; Cohen 2009)。本文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提醒，公民的參與意願存在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因此，公共審議在參與者的招募上，必須透過多重動員途徑來鼓勵女性和低教育程度者的參與，並在參與者的選擇上，盡可能包容不同社會群體，以降低參與的不平等。

但程序的努力，有時而窮。既有文獻指出，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公民心性與能力的差異，是頑固的現象。即使結社參與和日常公共討論可以提高公民心性與能力，但在結社參與和日常公共討論相當的情況下，男性與高教育程度者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和表達能力，還是比較高。公民心性與能力，受到社會化過程、日常生活情境、社會經濟位置所影響。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者的經驗和社會位置的差異，塑造他們迥異的公民心力與能力。公民審議不是

在社會文化結構的真空中運作；有更公平的社會，才能創造更平等的公民審議。

誌謝：本文研究成果來自作者所主持的科技部計畫「社會資本與審議民主：台灣民眾的日常政治討論與對公民審議的支持」（計畫編號 104-2410-H-002-112-）。本文使用的資料來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次」（計畫編號 NSC 102-2420-H-001-007-SS2），作者參與該次調查計畫公民權組研究問卷的設計，感謝問卷召集人傅仰止和其他學界同仁在問卷設計過程中提供的意見。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公民權：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十五次研討會」，感謝陳東升和其他與會者提供的意見。作者特別感謝洪晨碩對本文的統計分析所提供的協助。本文兩位審查人和編委會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也一併致謝。

附錄 「支持公民審議」及「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兩變項的卡方檢定

		參與公民審議的意願		合計
		不願意	願意	
支持公民審議	不支持	273 (70.54%)	114 (29.46%)	387 (100%)
	支持	517 (37.90%)	847 (62.10%)	1,364 (100%)
	合計	790 (45.12%)	961 (54.88%)	1,751 (100%)

Pearson chi2(1)=129.7017 Pr = 0.000

參考文獻

- 王靖興、王德育，2007，〈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對其政治功效意識之影響：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台灣政治學刊》11(1): 69-107。
- 王鼎銘，2007，〈成本效益、公民責任與政治參與：2004 年公民投票的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5(1): 1-37。
- 吳重禮、李世宏，2005，〈政治賦權、族群團體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2(1): 69-115。
-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8(4): 599-638。
- 吳俊德、陳永福，2005，〈投票與不投票的抉擇：2004 年總統大選與公民投票的探索性研究〉。《台灣民主季刊》2(4): 67-98。
- 吳親恩，2007，〈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差異：政治人物、政府與民主體制三個面向的觀察〉。《台灣政治學刊》11(1): 147-200。
- 范雲，2010，〈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台灣民主季刊》7(1): 65-105。
- 林珮婷，2014，〈男女有別？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初探〉。《選舉研究》21(2): 81-112。
- 林國明，2009，〈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台灣的發展經驗〉。《台灣社會學》17: 161-217。
- ，2013，〈多元的公民審議如何可能？——程序主義與公民社會觀點〉。《台灣民主季刊》10(4): 137-183。
- ，2014，〈審議的不平等：台灣公民會議的言說互動〉。《台灣社會學》27: 1-50。
- ，2015，〈十二年國教必須砍掉重練〉，《新新聞》1458: 94-97。
-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學》6: 61-118。
- 林聰吉，2007，〈社會網絡、政治討論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4(2): 1-24。
- 林瓊珠、蔡佳泓，2010，〈從成案到投票——2008 年討黨產與入聯公投的公投意向與參與行爲〉。《台灣民主季刊》7(3): 45-85。
- 盛治仁，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選舉研究》10(1): 115-169。
-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

- 陳東升，2006，〈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台灣民主季刊》3 (1) : 77-104。
- 熊瑞梅，2014，〈社會資本與信任：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反思〉。《台灣社會學刊》54: 1-30。
- 黃競涓，2008，〈女性主義對審議式民主之支持與批判〉。《台灣民主季刊》5 (3): 33-69。
- 張譽馨，2010，〈審議民主中的性別差異：2007年青年國是會議的經驗分析〉。《女學學誌》27: 275-316。
- 傅仰止，2014，〈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志願結社及日常接觸〉。《台灣社會學刊》55: 179-226。
- 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主編，2015，《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8，馬蕭憲政改革政策，（<http://www.npf.org.tw/post/11/4111>，取用日期：2015年5月15日）。
- 鄭敦仁著，許文英譯，2004，〈民主台灣之政黨：比較觀點〉。《台灣民主季刊》1(1): 27-40。
- Alexander, Damon Timothy, Jo Barraket, Jenny M. Lewis, and Mark Considine. 2012. "Civic Engagement and Associationalism: The Impact of Group Membership Scope versus Intensity of Particip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1): 43-58.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89.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cock, Alan, Harold D. Clarke, and Marianne C. Stewart. 1985. "A New Model for Old Measures: A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47(4): 1062-1084.
- Andersen, Ida-Elisabeth and Birgit Jæger. 1999. "Scenario Workshops and Consensus Conferences: Towards More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6(5): 331-340.
- Andolina, Molly W., Krista Jenkins, Cliff Zukin and Scott Keeter. 2003. "Habits from Home, Lessons from School: Influences on Youth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6(2): 275-280.
- Barber, Benjamin R. 2003.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axter, Sandra and Marjorie Lansing. 1983. *Women and Politics: The Visible Majori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ennett, Stephen E., Richard S. Flickinger, and Staci L. Rhine. 2000. "Political Talk over Here, over There, over Tim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1): 99-119.
- Bennett, Linda L. M. and Stephen Earl Bennett. 1989. "Endur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nterest: The Impact of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position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17(1): 105-122.
- Brady, Henry E., Sidney Verba and Kay Lehman Schlozman. 1995.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271-294.
- Brown, Mark B. 2006. "Survey Article: Citizen Panels and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4(2): 203-225.
- Campbell, Angus. 198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Joshua. 2009. "Reflections 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247-263 in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Thomas Christiano and John Christma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Comber, Melissa K. 2003. "Civics Curriculum and Civic Skills: Recent Evidence." in *Th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CIRCLE)*, http://www.civicyouth.org/PopUps/FactSheets/FS_Civics_Curriculum_Skills.pdf. (Date visited: May 15, 2015)
-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and Donald D. Searing. 2005. "Studying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Acta Politica* 40: 269-283.
-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Donald D. Searing and Ivor M. Crewe. 2002. "The Deliberative Potential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 (1): 21-62.
- Dahl, Robert Alan.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2004. "Mediating Democratic Engagement: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s on Citize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nd Civic Life." Pp. 395-434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dited by Lynda Lee Kai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Fay Lomax Cook and Lawrence R. Jacobs. 2004. "Public Deliberation, Discursive Participation, and Citizen Engagement: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7: 315-344.
-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and Scott Keeter. 1993. "Measu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1179-1206.

- Dryzek, John 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ryzek, John S. and Aviezer Tucker. 2008. "Deliberative Innovation to Different Effect: Consensus Conferences in Denmark,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8(5): 864-876.
- Elster, Jon. 1998. "Introduction." Pp. 1-18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dited by John El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eland, William P., Jr. 2004.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Producing Informed Citizens: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Elabo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2): 177-193.
- Eveland, William P., Jr. and Tiffany Thomson. 2006. "Is It Talking, Thinking, or Both? A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 of Discussion Effects on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3): 523-542.
- Eveland, William P., Jr. Alyssa C. Morey and Myiah J. Hutchens. 2011. "Beyo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Informal Political Conversation from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6): 1082-1103.
- Fishkin, James S. 2009.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7.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oley, Michael W., and Bob Edwards. 1999. "Is It Time to Disinvest in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2): 141-173.
- Fraser, Nancy. 1994.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Pp. 109-142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ung, Archon. 2003. "Survey Article: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Eight Institutional Design Choi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1(3): 338-367.
- George, Darren and Paul Mallery. 2003. *SPSS for Windows Step by Step: A Simple Guide and Reference*.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 Gutmann, Amy and Dennis Thompson. 1996.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96.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eld, David. 2006.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uckfeldt, Robert, Paul E. Johnson and John Sprague. 2004. *Political Disagreement: The Survival of Diverse Opinions with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keda, Ken'ichi and Jeffrey Boase. 2011. "Multiple Discussion Networks and Their Consequenc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8(5): 660-683.
- Jacobs, Lawrence R., Fay Lomax Cook and Michael X. Delli Carpini. 2009. *Talking Together: Public Deliber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m, Cindy D. and Carl L. Palmer. 2008. "Re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0(3): 612-631.
- Kaase, Max. 1999. "Interpersonal Trust, Political Trust and Non-institutionalis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2(3): 1-21.
- Klofstad, Casey A. 2010. *Civic Talk: Peers, 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La Due Lake, Ronald and Robert Huckfeldt. 1998.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19(3): 567-584.
- Leighley, Jan. 1996. "Group Membership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8(2): 447-463.
- Lukensmeyer, Carolyn J. 2014. "Key Challenges Facing the Field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10(1): Art. 24.
- Mansbridge, Jane. 1999. "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 Pp. 291-325 in *Citizen Compet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dited by Stephen L. Elkin and Karol Edward Solta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ansbridge, Jane, James Bohman, Simone Chambers, Thomas Christiano, Archon Fung, John Parkinson, Dennis F. Thompson and Mark E. Warren 2012. "A Systemic Approach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1-26 in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edited by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oy, Martha. 2014.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Light of the State of Our Democracy: My Democracy Anxiety Closet."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10(1): Art.13.
- Mondak, Jeffery J. and Mary R. Anderson. 2004. "The Knowledge Gap: A Reexamination of Gender-based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Journal of*

- Politics* 66(2): 492-512.
- Mutz, Diana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4): 838-855.
- . 2006.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blo, Michael A., Kevin M. Esterling, Ryan P. Kennedy, David M. J. Lazer and Anand E. Sokhey. 2010. "Who Wants to Deliberate-And Wh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3): 566-583.
- Newton, Kenneth. 1999.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Pp. 169-187 in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edited by Pippa No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ton, Kenneth. 2001. "Trus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2): 201-214.
- Newton, Kenneth and Norris, Pippa. 2000.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aith, Culture, or Performance?" Pp. 52-73 in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edited by 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ie, Norman H., Jane Junn and Kenneth Stehlik-Barry. 1996.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in America*. Chicago, I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elsen, Annika Porsborg, Jesper Lassen and Peter Sandøe. 2007. "Democracy at Its Best? The Consensus Conference in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0(1): 13-35.
- Niemi, Richard G., Stephen C. Craig and Franco Mattei. 1991. "Measuri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n the 1988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5(4): 1407-1413.
- Parkinson, John and Jane Mansbridge. 2012.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ewitt, Kenneth. 1965.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1): 96-111.
- 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Sanders, Lynn. 1997. "Against Delib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25(3): 347-376.
- Schlozman, Kay Lehman. 2002.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What Do We Know? Why Do We Care?" Pp. 433-461 in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W. W. Norton.
- Searing, Donald D., Frederick Solt, Pamela Johnston Conover and Ivor Crewe. 2007. "Public Discussion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Does It Make Better Citize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587-618.
- Shapiro, Robert Y. and Harpreet Mahajan.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cy Preferences: A Summary of Trend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1): 42-61.
- Teorell, Jan. 2003. "Linking Social Capital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Networks of Recruitment in Swede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6(1): 49-66.
- . 200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ree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Research Inventory and Agenda."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5): 787-810.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68.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Tolleson-Rinehart, Sue. 2013.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Torpe, Lars. 2003. "Democracy and Associations in Denmark: Chan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Associ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2 (3): 329-343.
- Uslan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Meer, T. W. G. Tom and E. J. Erik Van Ingen. 2009. "Schools of Democracy? 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17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8: 281-308.
- Verba, Sidney. 1996. "The Citizen as Respondent: Sample Survey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1): 1-7.
- Verba, Sidney, Nancy Burns and Kay Lehman Schlozman.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4): 1051-1072.
-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1987.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sh, Katherine Cramer. 2004.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nformal Groups and Social Identity in American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lebæk, Dag and Kristin Strømsnes. 2008. "Voluntary Associations, Trust, and Civic Engagement: A Multilevel Approach."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7 (2): 249-263.
- Wolfinger, Raymond E. and Steven J. Rosenstone.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yatt, Robert O., Elihu Katz and Joohan Kim. 2000. "Bridging the Spheres: Political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1): 71-92.
- Young, Iris Marion. 2000.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9(5): 670-690.
- Young, Iris Marion. 2003. "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p. 102-120, in *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dited by James S. Fishkin and Peter Laslett. Malden, MA: Blackwell.
- Zuckerman, Alan S., Josip Dasović and Jennifer Fitzgerald. 2007. *Partisan Families: The Social Logic of Bounded Partisanship in Germany and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